

德国作为 “欧洲的联合领导力量” ——基于国际角色演变根源的分析

于 芳

摘 要：在欧洲危机叠发的背景下，德国从“文明力量”角色转向“欧洲的联合领导力量”角色。德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德国在国际上的身份有不同的认知，政治精英希望能够更积极主动寻求更多外交空间，甚至可以考虑军事手段但将其作为最后手段；民众则始终坚持克制文化，支持政府积极治理安全危机，但反对使用武力。外部环境要求德国承担更多领导责任，但重要外交伙伴对德国的领导角色认同程度有较大差别。德国内外对其领导角色的期望有助于德国新角色的确立，但要实现外界对德国领导角色的完全认同还需要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国际角色；德国的领导角色；领导力量；联合领导

作者简介：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讲师 博士 北京 100089

中图分类号：D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4-0066-12

一、研究现状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欧洲相继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和难民危机，因而陷入了一体化困境。但在过去十年应对欧洲重重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凭借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实力和积极作用增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欧洲的领

导地位日渐突出。

关于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问题及其国际角色，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焦点是：德国是不是欧洲的霸权国家，以及德国如何实现自己的影响力？研究者们几乎都以欧洲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中的德国表现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但却得出了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针对欧洲债务危机，陈菲认为，在欧元区危机中德国是一位有效率的交易型领导者，尽管无法将自身目标全面转化为集体目标，但仍在妥协和坚持中力争寻找最大公约数^①。李巍、邓允轩认为，德国在欧债危机治理中实现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借助其宏观战略层面的公信力、向心力、强制力，以及操作手段层面上的设置议程、建构共识和寻求盟友，有效贯彻了危机治理的德国理念与模式。由此形成的具有德国特色的危机治理长效机制将会在危机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有效的指引、约束和监管作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公共物品，而德国也因此强化了自身的区域霸权地位^②。赵柯认为，德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隐藏在欧洲的集体行动中，以“欧洲”的名义和渠道投放自身影响力，如果德国不能推动欧洲财政一体化、巩固和完善欧元体系，则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力会被削弱^③。郑春荣认为，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等变化，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与来自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④。

针对乌克兰危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和德国尊重国际法的外交原则之间产生矛盾，默克尔政府选择将外交原则置于贸易关系之上，以应对整个欧盟所面临的困境^⑤；陈菲认为，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只是“首席推进官”，军事实力的短板导致其只能采取稍显单一的策略手段，试图承担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并不是真正的领导者。^⑥

^① 陈菲：《欧盟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领导有效性分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95-109页，这里第102页。

^② 李巍、邓允轩：《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第74-104页，这里第104页。

^③ 赵柯：《默克尔与领导力上升的德国》，载《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3期，第117-121页，这里第121页。

^④ 郑春荣：《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6页，这里第1页。

^⑤ Werner Weidenfeld/Wolfgang Wessels (Hrsg.), *Jahrbuch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2016*, Baden-Baden: Nomos, 2016, S. 2.

^⑥ 同注^①，第108页。

针对难民危机,帕特森认为在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中,德国主要发挥了“道德领导力”^①;陈菲认为德国希望成为变革型领导者,但是最终却只能选择成为交易型领导者;欧洲难民危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德国无法利用经济实力和道德感召力影响欧盟其他成员国^②。

法国国内政治分歧、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经济低迷,使得德国缺少有力的合作伙伴,而应对危机需要欧盟成员国之间更多的政策协调和沟通。在此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推动沟通与协调、寻求共同立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此,帕特森认为,德国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接近霸权角色,即塑造规则的角色,但由于德国的领导力不是主动寻求的结果,而只是在周边环境不断变化的时候力求保持自身的稳定,因而是“不情愿的霸权”^③。

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认为德国尚不是一个欧洲霸权,只是在欧债危机中以地缘经济霸权的形式成为一个“半霸权国家”。他认为历史上欧洲出现的“德国问题”的实质是德国军事实力强大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单独挑战它,但德国的强大又不足以应对两个或多个国家联合的挑战。在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德国问题”再度回归,德国的经济实力、德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赖性造成了欧洲的不稳定性,同时,一如历史上德国军事实力强大带来的后果,德国又无力承担霸权所意味的各种负担,只能算作半霸权^④。

此外研究者看到,德国愿意在欧盟和国际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努力实现其领导权。郑春荣认为,近年来德国在联合国、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的投入在增加,宣示并承担(参与)领导的角色,外交政策及其风格的调整使得德国未来行动灵活性增强,且德国要把最佳资源与能力投入联盟的伙伴关系中,寻求与欧洲伙伴一起领导^⑤。熊炜认为,德国在欧盟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权威基础,其获得欧盟领导权的策略是通过对法国妥协以换取合作、实现从法国“借权威”,以克服自身权威短缺且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常规渠道弥补的困难^⑥。

① 转引自 Werner Weidenfeld/Wolfgang Wessels (Hrsg.), *Jahrbuch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2016*, S. 2.

② 陈菲:《欧盟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领导有效性分析》,第108页。

③ 同注①, S. 1.

④ Hans Kundnani, “The retur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why conflict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states is now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European politics”, 2015-01-26,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5/01/26/the-return-of-the-german-question-why-conflict-between-creditor-and-debtor-countries-is-now-the-defining-feature-of-european-politics/>, 访问日期:2018-09-20.

⑤ 郑春荣:《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26-143页,这里第139-140页。

⑥ 熊炜:《“借权威”与妥协的领导——德法合作的欧盟领导权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30-50页,这里第30页。